希特勒放弃使用化学武器始末

二战期间，德国纳粹本可以在应对诺曼底登陆作战时对盟军使用化学武器，就此展开一场惨烈的毒气战，但最终还是放弃了这种做法。他们的放弃让百万盟军士兵捡回了性命。

希特勒曾被毒气所伤

希特勒为什么没有使用化学武器？一种说法是，希特勒对化学武器有心理阴影，因为在一战期间他曾遭遇英军释放的芥子气，导致暂时失明。而对于希特勒不使用化学武器的这种“仁慈”，近日，纽约州布法罗卡尼修斯学院著名化学与生物化学教授弗兰克·迪南给出了令人吃惊的全新解释。根据他们的解释，正是纳粹化学家奥托·阿曼洛斯对盟军使用化学武器还击能力的有意夸大，才促使希特勒重新考虑了他的作战计划。

本想充当杀虫剂

奥托·阿曼洛斯生于1901年，是一名德国化学家，曾获得战功十字勋章，被认为是德国战事不可或缺的人物。

阿曼洛斯投入最多时间和精力研究的化学制品名叫塔崩。1936年12月23日，第一批塔崩被制造出来，当时法本公司的吉拉德·施拉德博士准备将这种制剂充当杀虫剂。施拉德发现塔崩能够有效杀死叶虱。但在随后一个月，这种化学制品被最终证明对人类同样具有毒性。

塔崩可以通过肺部、皮肤甚至眼睛进入体内，即使只有1毫升透过皮肤进入人体也具有致命性。纳粹很快便将塔崩视为一件具有发展前景的新武器，开设了一家工厂，专门用于大规模制造这种神经性毒剂。

截至1943年，德国已经生产了12500吨塔崩，其中大多数被装入炮弹和炸弹等武器。纳粹当时认为塔崩就是二战中最具致命性的武器，他们对此毫不怀疑。

忽悠元首放弃毒气战

1943年5月，在斯大林格勒溃败后不久，希特勒便召见军备部长阿尔伯特·斯佩尔和阿曼洛斯，讨论化学武器的使用。

对于盟军的芥子气，希特勒并不担心，真正让他担心的是英国人和美国人是否能够研制出类似塔崩这样更为致命的神经性毒剂，他需要得到一个明确答案。就是在这个时候，阿曼洛斯说出了被迪南教授认为可能改变战争进程的一段话。他说：“我有理由相信国外也已经知道塔崩的存在。据我所知，塔崩早在1902年就已经被公开，并申请了专利。”

希特勒正是在这个时候意识到，盟军可能使用塔崩或者类似化学制品进行报复。他陷入深深失望之中，最后终止了会议。在随后的交战中，希特勒的很多部下继续向他施压，劝说他下令使用塔崩等神经性毒剂。希特勒从没有改变他的想法。

突然良心发现？

实际上，塔崩是在1937年才获得专利。阿曼洛斯对化学武器可以说是“万们指掌”。如果说他把1937年和1902年这两个年份搞混，显然无法令所有人信服。那么阿曼洛斯为什么要误导希特勒？真正的原因已经无从考究。或许是突然的良心发现，因为在1943年5月举行的那场会议中，再没有人能够比阿曼洛斯更清楚发动一场化学战将产生怎样可怕的后果。

1947年8月至1948年7月，阿曼洛斯因反人类罪在纽伦堡接受审判。受审中，他详细讲述了与希特勒的此次谈话。如果事实确如迪南教授所说的那样，阿曼洛斯便是有史以来最罕见的一个人，既是一个战犯，同时又成为一个英雄。

（摘自《郑州日报》）

“阿美士德”号探访大清

1832年，一艘名叫“阿美士德”号的英国商船从澳门出发，没想到，竟引起了清最高当局及沿海地方官府的惊慌失措。

“阿美士德”号由英国东印度公司驻广州大班派出，首要任务是商业考察，主要成员有船长士礼、东印度公司职员林德赛（化名胡夏米）。

在厦门，胡夏米对地方官员表达了贸易的意图，水师提督陈化成派人回复曰：船必须尽快离开，食物可以免费赠送，但决不允许上岸与百姓接触。胡夏米拒绝了，说他们的惯例是按价购卖。他给陈化成上书再次表示贸易需求。清方的回复还是那一套：快走，不许与我们百姓接触，否则严拿百姓绝不宽容。胡夏米原本的打算是货物卖出后，就南下回澳门，但因为没有百姓敢与他们交易，只好继续北上。

在上海，胡夏米致禀苏松太道吴其泰要求贸易。吴其泰批曰：向无此例，不准！胡夏米抓住两点大做文章，一是称他们为“夷”了，大英国不是“夷国”，而是“外国”；二是对信件“原呈掷还”，有伤大英国体。吴其泰回曰：“南蛮北狄东夷西戎。自古至今，总是照此称呼。况中华舜与文王都是大圣人，孟子尚说：‘舜，东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岂是坏话，是你多疑了。”

吴其泰虽然学识丰富，但挨不住遇上了胡夏米这么一个中国通。胡夏米引经据典，说苏东坡都说过“夷狄不可以中国之治治也。譬若禽兽然”云云。称大英为夷，不是凌辱又是什么？吴其泰只好让步，复信中改称“英国商人”，但有关通商则是一点也不让步。

在山东，他们在威海卫停了一天就折往最后两站：朝鲜与琉球。对于贸易要求，朝鲜回复说：“朝鲜国服事大清国，只遵大清国的旨”。琉球方面回复说：“敝国蕞尔蜃疆，土瘠地薄，产物无几。”总之，它们都与清国老大一个德性，俺就不跟你贸易，气死你！

对于这次考察的商业收获，德国传教士郭士立总结如下：“这次航行的结果，使我产生这种信念：只要英国政府坚持要求，与中国东北部的贸易是可以开放的。我的微小的愿望是英国政府将会替英国商人获得这样大的贸易的”。一句话，想与中国自由地和平地贸易，行不通，还得政府出面打开这市场啊！

（摘自《新京报》5.2 端木赐香/文）

『精神太监』纪晓岚

整个清代，纪晓岚可以算是文化方面屈指可数的几位代表性人物之一。随着电视剧《铁齿铜牙纪晓岚》的热播，大家对他的许多故事都耳熟能详，然而，大家未必熟知的是纪晓岚超乎寻常人的“纵欲”。

纪晓岚的“纵欲”主要表现在“食”和“色”两个方面。在“食”方面，据说其饭量奇佳，动辄每顿吃掉十数盘猪肉。而在“色”方面的表现，竟然“年已八十，犹好色不衰”。

前人的野史笔记都将此归之于一种单纯的生理现象，认为纪晓岚是“奇人”。但我个人倾向于认为，作为一位才情冠绝一时的大知识分子，纪晓岚的“好肉”与“好色”，是一种特殊的精神现象。

纪晓岚为世人所瞩目的文化成就主要有两项：一是奉旨主持编纂了《四库全书》；二是在晚年写了一部“追录旧闻，姑以消遣岁月”的随笔杂记《阅微草堂笔记》。然而，这些作品的含金量并不高。关于《四库全书》，鲁迅、唐弢等人曾将其评价为一部阉割中国古文化的集大成之作。至于《阅微草堂笔记》，虽然皇皇24卷，但是仔细阅读过它的人都会发现，这部明显受了蒲松龄《聊斋志异》影响的笔记体杂记，除了语言精美典雅、行文亦庄亦谐外，很少有震聋发聩的独到而新颖的观点和见解。

纪晓岚之所以没有写出与其才情相匹配的巨著，并不是他缺乏成为“一代宗师”的才情、阅历和精力。结合当时的政治气候，不难推究其中原因。清初的文字狱是相当严酷的，在编纂《四库全书》的期间，就发动了48起。纪晓岚一方面眼见许多著作因为政治问题而被禁毁或者篡改；另一方面，耳闻目睹当代许多文人因言惹祸，或者丢掉官职，或者全家被株连的遭遇，他不能不对文字工作的危险性产生足够的恐惧，因此只能选择“鸵鸟政策”以自保。

从另一方面分析，乾隆皇帝之所以选择纪晓岚这样一个有声望的汉族大知识分子来领衔编纂《四库全书》，其中固然有满族八旗当中尽皆“绿林大学”毕业，“修文”则实在拿不出手的考量，但在其内心里恐怕也不能排除通过编纂《四库全书》，让这个汉族的大知识分子接受一次再“教育”的“小九九”。

纪晓岚看起来颇得圣宠，地位显赫，但实际上只是乾隆皇帝的一件小摆设而已。有一次，纪晓岚为他的一位犯了罪的朋友尹壮图求情，乾隆皇帝闻听之下立即勃然大怒：“朕以你文学优长，故使领四库书，实不过以倡优蓄之，尔何妄谈国事！”这样的一句“夫子自道”不可能不在纪晓岚的心里留下难以挥去的阴影。

正是在这样的一个极端残酷的政治环境下，纪晓岚通过编纂《四库全书》这项工程，一方面秉承主子的意思，极力对古人的著作进行全面的“阉割”；另一方面，在“阉割”古人的过程中，自己也被有意无意地实施了“精神自宫”手术。

他在被清朝的统治者“阉割”了精神和思想上的创造性，变成了一个“精神上的太监”之后，便迅速地滑向了肉体上的纵欲和狂欢，试图用这种狂欢，来消磨豪情，转移自己内心的压抑和痛苦。

（摘自《大历史的小切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周英杰/文）

古代如何治理『公费旅游』

古时候的交通极不发达，各地人员往来极为不便，为了解决通行问题，加强各地联系，自秦汉时起，中央政府就建立了相应的沿途接待制度，由各地的地方官府设立“驿站”，负责过往官员的接待服务。驿站所需物资、经费由中央或地方政府负担。于是，驿站的建立就为公文传递和官员出差提供了方便：一是免费使用车船马匹等交通工具；二是免费供应食宿；三是能获得当地的一些土特产。

到了唐代，公务往来日益频繁，这项制度也日臻完善，不仅中央政府设置了招待所“驿”，而且地方政府也设置了“馆”，形成了数量众多的“驿馆”。既为官员因公出差这种日常的行政管理活动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也是对官员的优待，进而演变为一种特权。

明朝初年，贪苦农民出身的明太祖朱元璋，吸取元末“给驿泛滥”导致官吏腐败、民怨沸腾的教训，从洪武元年就颁布法令对某些特权者进行了限制。他命令“非军国重事不许给驿”，明示大小官员“不得擅乘驿传船马，违者罪之”。朱元璋还注重理论实践相结合，杀鸡给猴看，拿自己的亲属“先正纲纪”，以儆效尤。洪武三十年，驸马欧阳伦擅自动用驿馆的数十辆马车走私茶叶出境，朱元璋得知后立即下令将欧阳伦赐死。

被百姓誉为“海青天”的海瑞担任淳安知县期间，有一次，兵部尚书胡宗宪的公子恰巧路过淳安，本想好好享受一番，却被淳安驿丞（管理驿馆的小官）的简朴接待方式激怒，竟然将驿丞倒吊着打了起来。海瑞也不是吃素的，他下令将胡公子关押起来，并上报他的老爸胡宗宪：“您曾明确指示不许大操大办地搞接待，现在却有人胆敢冒充您的公子招摇撞骗，我特向您请示如何处理。”闹得胡宗宪哑巴吃黄连。

（摘自《旧闻新知》第1期 刘亮/文）

无法想象积病孱弱的晚清帝国，在风雨将来、财政入不敷出的窘境下，还曾经屡屡对他国灾害施以援手。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二月，清朝政府“颁帑十万助赈日本灾”。这样规模的经济援助是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国对日本的首次援助。

清政府第二次援助日本是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九月，“日本以水灾来告”，晚清政府怀着“国际情怀”，赈济日本六十万石大米。

晚清中国的国际援助行动

1908年12月28日，意大利西西里岛的墨西拿市发生7.5级地震，清政府仍然没有袖手旁观，毅然“出帑银五万两助赈”。

此外，晚清政府对海外的华人也体现着祖国的“关心”。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三月，美国旧金山地区发生8.3级地震，清政府“颁帑十万赈华民”。

其实，1905年-1908年的中国，饥荒、灾害几乎遍地皆有，多数省份都需赈济。不仅是天灾，其时，各地剿匪的大笔军饷开支也是清政府在正常行政开支之外的一项沉重财政负担。

然而为什么在这种窘况之下，清政府还积极地搞国际援助呢？

原来，在两次鸦片战争以及甲午战败后，晚清政府很想融入国际社会，从而学习国际经验，实现社会改良进步，以达到巩固满族统治的目的。

晚清积极谋求着国际社会的认同，然而，光想光说是不行的，这就需要通过多种方式来改变自己的形象，国际援助，发扬爱心，便是其中一种策略。

然而，从后来的历史来看，靠对外的金钱捐助改变国际形象的策略，显然是失败了。

（摘自《羊城晚报》4.11 李晓巧/文）

都市“走婚”族 越“走”越淡漠

他们是生活在同一座城市的夫妻，却很少共同生活在一个屋檐下。他们各有各的生活轨道，各有各的生活空间，就像两个交叉的圆，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相会。这群现代都市里的“走婚”一族，正在展示一种新的婚姻观……

美好期待：小别胜新婚

逛街、看电影、烛光晚餐……又到周五，已经5天没见丈夫的颜敏，精心打扮，满心期待着即将到来的两天约会。这样的“周末夫妻”生活，她和丈夫已经过了大半年时间。用她自己的话说，每次看到丈夫都有一种新的感觉。

颜敏和丈夫是大学校友，恋爱5年，结婚3年。颜敏在杭州市区一家广告公司工作，丈夫则在滨江一家企业工作。恋爱时，两人虽然相隔一条钱塘江，但平时见面总是互相迁就，赶来赶去，也很甜蜜。

后来，丈夫在滨江买了一套房子，两人便把家安在那里。结婚之初，每天下班，颜敏总是迫不及待地穿过拥挤的车流和人流，赶回家和丈夫相聚。丈夫也早早地回到家里，为妻子准备晚餐。可是随着结婚时间变长，面对柴米油盐的生活，颜敏渐渐地下班后不再那么急着回家，经常约几个朋友吃吃饭、逛逛街。两夫妻的生活越来越平淡。

改变源于去年夏天。公司派颜敏到北京培训，一呆就是20多天。小别胜新婚，回到杭州后，夫妻俩又感受到恋爱时的那份激情。“适当的分离，对爱情保鲜还是有作用的。”颜敏萌生了“平时分居、周末相聚”的念头，没想到她一提出，就得到丈夫的支持。

某大型门户网站曾做过一个关于“走婚”的调查，在近万名26岁至35岁的参与者中，认为“会尝试”的占50.7%，这似乎也印证了“走婚”在年轻夫妻中的受欢迎程度。和颜敏一样选择“走婚”生活的夫妻认为，即使再美好的东西，天天看着也会腻味，彼此之间保持一点距离，相聚时把好的一面展现给对方，会使爱情之树常青。

现实隐忧：越“走”越淡漠

让婚姻持续鲜活，确实需要时时保鲜，但是不是“相见不如怀念”、“距离产生美”，就是对幸福婚姻的良性刺激？

一位名为“angel”的网友曾在网上讲述了自己的烦恼。她和丈夫分居一年，平时各过各的生活，只有在周末和节假日的时候，才聚在一起。一开始，两人都为久别重逢的甜蜜感欣喜不已，但时间一久，她发现自己越来越不想回家，常常忘记自己还有丈夫。

这位网友的情况并不是个例，不少因为“走婚”生活而导致婚姻问题的事例不在少数。

31岁的陈菲一年多前，在朋友的“指点”下，和丈夫当起了“走婚”一族。“那段生活的甜蜜程度甚至超过了蜜月，感觉爱情又回来了。”可是，好景不长。渐渐地，陈菲发现丈夫经常一到周末就以加班为由，取消约会，他们之间“走婚”的频率也逐渐下降。

今年2月，陈菲回家，无意中发现电脑上丈夫与一名女同事的暧昧对话。面对质疑，丈夫也承认分开这段时间，觉得寂寞时，会和同事和朋友聚会，久而久之，让别人有了可乘之机。听到这里，陈菲顿觉五雷轰顶，非常后悔，但一切似乎已经太迟了……

“‘走婚’一族虽然看上去很时尚，但并不是所有的夫妻都能付诸实施，要因人而异。”婚恋危机处理专家指出，“半糖夫妻”是要建立在充足的物质基础和足够牢固的感情基础之上的。

虽然不是每个选择“走婚”生活的夫妻最后都会落到这种不好的结局，但就相关机构接手的类似案例来看，“走婚”确实有寂寞渐生、夫妻关系逐渐淡漠的隐忧，都市中的诱惑本来就多，分开的日子可能会让双方更充分地体现自我，也可能会给予婚外恋更多的机会，导致婚姻危机。

情感话题

（摘自《浙江日报》方力、陈勇/文）

真正的朋友

今天的称呼中，“朋友”这个词最泛滥。

见了面，一时想不起名字的，最恰当的招呼：“朋友。”可能是点头朋友，这，还算关系“吃紧”的。现在，在路上问个地址，举手招呼：“朋友，请问……”饭店里，烟瘾上来了，打火机不见了，向邻桌敬个礼：“朋友，借个火。”厕所里，等不及，催着喊：“朋友，快点！”弄堂里，两车面对面，互不相让，探头出窗：“朋友，哪能啦？”甚至厚拳擦掌：“朋友，侬讲哪能？”

认识，不认识，甚至仇人，统统叫朋友。“朋友”二字，本来是非常紧密的小楷，现在被无限放大成大字，结构松散得很，又气的墨痕淡若水清。

过年时，手机里祝福短消息铺天盖地，千万别自以为“我们的朋友遍天下”，那里面都是中转的批发货，言未必由衷！房产中介、放高利贷的投资公司业务员们也发短消息。因为有利益需求，才衍生出那么多的朋友，有点像股市里的泡沫。

真正的朋友，节日里不发短信，平时也无电话寒暄，一旦有事，拿起话筒，连“不好意思”的客套话都没有，直奔主题。不管事大事小，只要办得到，没二话可说。

真正的朋友舍己相助，超越利益，没有“一报还一报”的概念。它的本意，只能从《说文解字》里寻觅，在《史记》中找到刎颈之交的佐证，现代生活中很难找到旁证了。

情感感悟

（摘自《广州日报》李大伟/文）

白头偕老

乘坐的电梯忽然停电了，失重的那一秒，我惊恐地抓住前面女人的肩膀。等平稳下来，有人按了紧急对讲，汇报所在单元和电梯号，嘈杂声此起彼伏。

第一次遭遇电梯意外的我，像在预习2012。看了看梯内乘客，有年轻情侣，有中年夫妇，他们互相安慰，而边上一对老人显得沉默，拄着拐杖的老太，和站在她旁边的老头并无交谈。过了十几分钟，电梯门被扒开了，本着老弱妇幼优先的原则，我们让腿有毛病的老太先上，可她动不了身，老头也没有搀扶的意思，自己先出去了。我心里一沉：莫非不是她先生？直到大家陆续爬了出来，留下的两名壮年男子才帮忙着把老太抬上去。整个过程，老头没有感谢，老太没有抱怨，只是人群散去时，他和她又一起走了。

这样的一幕，让我对“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刮目相看。想起朋友讲过一对老年夫妻的故事，坐在轮椅上的老头风雨不改地要去赌场，嫌推轮椅的老太走得慢，两个人吵了起来，老太大喊一声“财散人安乐”，把轮椅甩手一推，出了马路几米。路人吓了一跳，幸好是红灯，轮椅差点就撞上旁边的车。老头竟也镇定自若，老太继续推着轮椅，和他吵吵嚷嚷过了马路。

对比之下，电梯惊魂也只是小巫见大巫了。“我们如何白头到老”是个深奥的问题。

也许有一天，他们白头到老了，不再花力气吵架，不再抱怨和不满，成为心硬的老人。不管生病还是残弱，就这么一前一后在风中，在人群中，以沉默的冷面对旁人的目光。但还是可以听见有人在说：“我们不是以强烈的爱度过一辈子，而是强大的习惯。”“没有离弃就算好的结局了。”

情感视点

（摘自《南都周刊》第5期）

爱情不过是场记忆

“我已经老了，有一天，在一处公共场所的大厅里，有一个男人向我走来。他主动介绍自己，他对我说：‘我认识你，永远记得你。那时候，你还很年轻，人人都说你美，现在，我是特地来告诉你，对我来说，我觉得现在你比年轻的时候更美，那时你是年轻女人，与你那时的面貌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很多人都曾被杜拉斯《情人》的这个开头震撼。因为它超出了我们的认知，超出了常理，而显得如此具有吸引力。

“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恐怕这样的话在现实生活中，没有哪个女人会相信。爱情从某种程度上说，不过是荷尔蒙分泌，谁会为一张备受摧残的脸分泌荷尔蒙呢。“色衰爱驰，爱驰恩绝”，汉代的李夫人就因为深谙所谓爱情的玄机，才拒绝让汉武帝见最后一面。

“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当汉武帝刘彻听到这首曼妙的歌曲时，不禁问道：“世上真有这样的佳人吗？”设筵的李延年说：“有，这歌唱的正是我的妹妹。”于是，李夫人被送到帝王面前。

刘彻一向多情，在此之前，陈阿娇、卫子夫都曾经集百般宠爱于一身。但他也绝情，陈阿娇已被软禁于长门宫之内，卫子夫也成了昨日黄花。李夫人出现得正是时候。

但红颜薄命，年纪轻轻的李夫人却在最好的时候，病倒了。病情严重之时，刘彻前去探望，李夫人用被子蒙住脸。刘彻非常心疼，说，只要让他见上一面，就加赐千金，并封她兄弟为官，但李夫人坚持不见。

前来探望的姐妹，好奇地问李夫人：“你既要托付兄弟的事情，和皇帝见面不更好说吗？”而李夫人竟回答道：“正是因为要托付兄弟的事，所以才不能和皇帝见面。大凡以色事人，色衰而爱弛，爱弛则恩绝。今天我已病人膏肓，他若见我容颜衰败，必然心生嫌恶，惟恐弃之不及，又怎么会在我死后照顾我的兄弟？”

李夫人的一番话，像一盆冷水一样，泼得人直打寒战，但却道出了最简单直白的道理。

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些什么？美国作家雷蒙德·卡弗说，爱情不过是一种记忆。显然李夫人看穿了这点，并终于让他们的爱情永远只留在刘彻的记忆里。

情感密码

（摘自《那些爱与哀愁》石油工业出版社 阿零/文）

重逢

事业失败之后才发现除了开车之外，自己好像连说得出口的专长都没有，所以最后他选择开出租车。他专跑机场，心里期待着，如果前妻带孩子们偷偷回国的话，说不定还有机会见上一面。

孩子和前妻一直没碰上，没想到先碰了昔日的爱人。

那天车子才靠近，他就认出她来了。除了发型，她好像一点也没变。

上车后，她只说了一个医院的名字和“麻烦你”之后就沉默地看着窗外，反而是他自己一直担心会不会因为车子里的名牌而被她认出来；不过，她似乎没留意，视线从窗外的风景收回来之后便拿出电话打。

第一通电话她是打回澳洲的家，听得出先生出差去英国，她轮流跟两个孩子说话，最后他才听出是她母亲生病了，因为她说：“我还没到医院，不过妈妈相信外婆一定会很平安。”

他还记得她母亲的样子和声音，以及她做的一手好菜，更记得两人分手后的某一天，她到公司来，哽咽地问他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我女儿？”那种颤抖的语气和哀怨的眼神。

他们大学时候就是一对，毕业之后他去当兵，而她在外商公司做事；退伍后，她把一些客户拉过来，两个人合伙做，三年后，两人公司变成二十几个人，而他却莫明其妙和一个客户的女儿上了床。

车子经过昔日公司的办公室，两旁的台湾栾树正逢花季，灿烂的秋阳下一片亮眼的金黄。

后座当年的爱人正跟之前公司的某个同事话家常，说孩子说女人到了一个年龄阶段的感受，然后说停留的时间以及相约见面吃饭。

车子最后停在医院门口，他还在躲避，也在犹豫要不要跟她收费或者为她打个折，没想到后头的女人忽然出声，笑笑地用极其平静的语气跟他说：“我都已经告诉你所有近况、告诉你现在的心情、告诉你对一些人的思念……什么都告诉你了，而你……连一声简单的问候都不肯跟我说？”

情感邮箱

（摘自《这些年，那些事》吴念真/文）